



學海一牛鳴

錢仲聯
著



清代学术思想的变迁与文学

马积高

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 90012719

清代学术思想的变迁与文学

马积高 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學海一牛鳴

錢仲聯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代学术思想的变迁与文学/马积高著.—2版.—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6

(学海—牛鸣)

ISBN 7-5438-1162-6

I.清... II.马... III.①学术思想—变迁—研究—中国—清代②学术思想—变迁—关系—文学—中国—清代 IV.①B249.05②I206.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012178号

责任编辑:熊治祁

装帧设计:陈新

清代学术思想的变迁与文学

马积高 著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展览馆路66号 邮编:410005)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2002年6月第2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7.125

字数:395,000

ISBN7-5438-1162-6

K·225 定价:29.00元

编者的话

《学海一牛鸣》是一套学术著作丛书，专收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著述。

改革开放以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空前活跃，并越来越深入。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是为了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古为今用，更快更好地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国家。这套丛书旨在为最新研究成果提供一个学术园地，促进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深入与繁荣。我们将遵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本着社会效益第一的原则，积数年的努力，出好这套丛书。

“一牛鸣”除字面一般意义以外，又为“一牛吼地”^{*}之简称，指牛鸣所及的距离。这套丛书兼取二者之义，凡一部高水平的学术著作问世，即犹如牛之一鸣，其声宏亮，必然飞震林樾，闻于远处。学海茫茫，添一新作，又说明著述者已向前跨越一新的里程。

蒙著名学者钱仲联先生为丛书题签，谨此致谢。

湖南人民出版社

* 一牛吼地，梵语长度单位“拘卢舍”的意译。《大唐西域记》卷第二《印度总述·数量》：“拘卢舍者，谓大牛鸣声所极闻。”

前言

在写完了《宋明理学与文学》之后，我就想写一本关于清代学术思想与文学的关系的书。但因为忙于别的事，其间又病了一场，久久不得恢复，及至最近才基本完稿，已是一九九四年又将结束了。

谈清代学术思想的变迁与文学的关系，必须对清代学术思想与文学这两方面都有较深入的考察，而我在这两方面的根柢都颇浅。清代桐城派大师姚鼐提倡“读常见书”，这个意见是不完全正确的，有时候要取得学术研究上的新进展，需要有常见书以外的新资料的发现。龟甲文的发现开辟了中国古文字研究的新纪元，敦煌石窟藏书的发现，开辟了唐史（包括唐文学）研究的新天地，马王堆帛书的发现，使我们对先秦汉初的历史增加了许多新认识，都是人所共知的例子。但姚鼐的意见也非全无道理。庄子说过：“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逐无涯，殆已。”要尽读秘籍、僻书往往是不可能的，何况近些年来在商品浪潮的冲击下，进某些图书馆找书的代价，殊非我辈所能承受。所以我遂亦奉行姚鼐的办法，以读常见书为主，或者说以读名家之作为主。这部小书，就是我读清代著名学者、作家的著述和一些总集、选本（如《晚晴移诗汇》、《清诗铎》之类）的

心得的纪录。非名家的著作也看了一点，然以就近图书馆能见到者为限。只凭着这个阅读范围来考察一代学术与一代文学的关系，自然难以细致和深入。但清代距我们毕竟比较远了，经过历史的淘洗，那些尚崭露头角的名家、名作，总是有其现实的基础、代表着某种时代潮流的。据之以视一代的学术和文学，我想，总的趋势和概貌大概是会相去不远的，问题就在于对这些名家、名著及其他常见作品的把握如何了。

对清代学术思想和清代文学都有人分别作过研究，对它们的发展趋势作过概括；对它们的关系则似乎尚未有人作过专门的研究，只是有人附带提及或就局部问题作过探讨。这些论著，由于条件的限制，我也不一定都看过。就已见者而论，各人的把握和概括是颇不相同的，究其原因，既有各人思想观点的区别，也有考察视角的区别，姑以前辈学者为例，对清代学术思想的概括，梁启超、钱穆、侯外庐就有很大的分歧。以对清代文学的认识来说，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几乎一笔抹煞，与其同时学者的看法也大相径庭。对于这些分歧，我的态度是力图把它放在历史的背景下作客观的分析和评价。但本书的目的是在考察学术思想的变迁对文学的影响，它的基本立足点还是在文学。文学是有其特殊的规律和作用的。某种思想学说虽可能自有其历史的意义或自有其价值，对文学却不一定起促进作用，甚至是起消极作用。我在《宋明理学与文学》中就说明程、朱理学虽对中国哲学的发展有过贡献，对文学却基本上起着桎梏的作用。所以学术思想与文学发展并不完全相应，某些方面甚至相反。在考察有清一代的学术与文学的关系时，我也发现类似的情况。为了避免以偏概全，我除了在有关部分作了必要的交代之外，这里特就有关全局或大局的几个问题作简

略的说明。

（一）对清朝（主要指嘉庆以前）的历史作用的评价

本书没有也不必要论述清朝的全部历史作用。但在论述清代学术思想的变迁及其与文学思潮、文学创作的关系时又不能不涉及当时的政治、经济，特别是清朝的文化政策、民族政策等。应该承认，清朝在这些方面都是有某些积极的历史作用的。从民族政策来说，它对蒙古、西藏的政策都比较成功。与西南和西北其他少数民族的关系不是处理得很好，以致多次同这些地区的少数民族发生武装冲突，及到咸、同间才基本上巩固了统治。但这不是清朝一方的问题，一些少数民族上层人物也要负责任。就清朝一方来说，也主要不是政策的失误，而多因封疆大吏处置不善。清朝对处理人口占多数的汉族更费了心思。它基本上做到了与汉族地主阶级代表人物分享政权，对汉族聚居地区也实施了对发展社会生产有利的政策，解放贱民和摊丁入地就是最重要的两项“惠政”。中国历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但对各民族居住的地区能实行有效的统治，形成较巩固的民族集体，清朝在历代王朝中应是值得称道的一个。清朝的文化政策也非全无可取，它对各民族的传统文​​化基本上能采取兼收并蓄的态度，对汉族传统文化的保存和发展也有一定的贡献。这些，都是不能抹煞的。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作为清朝核心的满洲贵族，对汉族始终是抱着歧视、压制态度的。特别是推行薙发和旗服，对汉族各阶级的人是空前未有的大打击。（这是现今一些赶时髦的人难以理解的，但当时确是汉人最伤心的事。）清朝专制制度的严密和文字狱的残酷、频繁更是超过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代。试以明代相较，明代尚有阁员的会推制度，清代

没有了；明代吏部权重，常能操官吏铨选之权，清代吏部权轻了。明代朱元璋时期颇多文字狱，后来少见；清代则自顺治延续到乾隆，共一百余年。故其结果，明代中晚期虽多庸君、昏君，却多直臣；清代虽少昏君，却鲜直臣，而多庸臣。多直臣，则士气奋，故虽衰败，而民族的正气不衰；下面的发奋图强之风愈盛。明代中期以后，朝政日非，士大夫却能在没有外来思想的冲击下（明末虽有西方思想的输入，但不能算冲击），纷纷起来探索救国救民之道和历史前进之路，即其证。多庸臣，则士气衰，人习苟安，害怕改革，不敢改革。清道光以后遇到强大的外来思想的冲击，虽有人起来要求改革，却遇到极端强大的阻力，倘非有种族革命思想的再起，几不能打破庸人的阻挠，且在种族革命论者中，还有不少在其他方面害怕改革的人。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非一，中国封建制度源远流长，结构特别坚固应是重要原因，但清朝二百余年所培植的庸腐的士风也起了恶劣的作用，人们常记起龚自珍的诗句：“万马齐喑究可哀。”其实，万马齐喑的局面并不是在道光间才形成的，从清初起，统治者就千方百计用爵禄与屠刀制造这种局面。这是我们研究清代政治史、学术史、文学史都不应忽略的。

清朝的闭关锁国政策，也较明朝有进一步的发展。明朝只允许外国用进贡的方式与中国进行贸易，较宋元时准许私人通商，已是一种倒退；又因防倭寇骚扰，多次严申海禁，已开闭关锁国的先声。但明代的海禁是有条件的，主要是限制与日本的贸易，与南洋各国的贸易从未断绝。成祖、宣宗朝还有郑和七次航海下西洋（即南洋）的壮举，其船队曾远至非洲和阿拉伯。宣宗以后，私人通商实际上也被允许了（参考李剑农《宋元明经济史稿》第六章）。惟后期不知保护华侨，以致让相继东

来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国在南洋及台湾等地排挤乃至屠杀华侨、华人，则是严重的失策。又明朝统治者也不注意了解世界形势，有不少士大夫把葡萄牙、西班牙都称为佛朗机即其例。但这主要是当时东西交往才开始的缘故，并非对西方文化害怕和抗拒，意大利人利马窦来华传教，有人主张驱逐，万历帝就不许，留其在北京居住，还召见询问外国民风国政等事。士大夫如徐光启、李之藻等人，更与利马窦、熊三拔等教士往来密切，向他们学习西方的学术，一大批西方的学术著作，包括数学、物理学、地理学、哲学因此传到中国，并被译成中文。清朝则除康熙帝曾注意西方的天文、历算学，并曾任用过南怀仁、汤若望掌管天文历算外，雍、乾、嘉三朝对外国人的传教是禁止的，更谈不上吸收西方的学术（少数学者如梅文鼎等研究西方数学，乃是借明朝时的翻译本），中西文化的交流完全中断了。至于海禁，则更严，不仅严禁华人出国，外人通商也仅限于广州、澳门两地，不许他们到内地来。中国人因此更不了解世界的情况。清朝的统治者又盲目自大，以天朝自居。乾隆五十八年英王乔治二世派特使马加特尼到热河行宫谒见乾隆帝，请求通商，清廷不但要求其行跪拜礼，还要求他自认为藩属国，并由乾隆写了一封傲慢的诏书加以训斥，所求一概不准，即其例。鸦片战争后，清廷曾宁愿割地赔款，也不许外国使臣进京，既许进京，又坚持要行跪拜礼，即师弘历（乾隆帝名）之故技。早年曾经有一部电视，把中国的进步缓慢都归罪于黄河，殃及长城，并以朱元璋（明太祖）与玄烨（康熙）对比，说朱元璋修筑长城是闭关，玄烨不修长城是开放。殊不知朱元璋修长城是为防御元朝残余势力的复辟，清朝的祖宗本在关外，玄烨如修长城，岂不是把祖宗的“龙兴之地”革除出去么？就严海禁

而论，朱元璋与玄烨也是有别的。朱元璋是为防外（倭寇）；玄烨开始是为防止台湾郑氏，还勉强可说有点“理由”，后来就毫无道理了。

（二）关于清代考据学的历史意义及其对文学的影响

清乾嘉时盛行的考据学（朴学、汉学、历史文献学）是清初重实学的风尚由意在经世致用转向全面整理、研究文化遗产的结果，它在整理研究历史文献方面是取得了很大成绩的。梁任公（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近三百年学术史》中作了较为全面的论述。其中虽间有偏颇或不足之处，如对其师康有为在春秋公羊学方面的成就，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显然过高；对戴东原（震）作为一代宗师的成就就阐述得不充分，对戴氏在哲学上的贡献的论述稍嫌粗略；对章太炎在语原研究上的创造略未提及等；但清代考据学的主要成就，大体上已具于二书了。我这本小书意不在论述清朝的学术成就，只是把考据学当作一种学术思潮来看，并考察其对文学的影响，故主要从其与清朝的政治和文化政策的关系这一方面加以论述。从这一方面看，考据学虽有其历史的进步性，但其进步意义是有限的。

作为一种学术思潮，我觉得，考据学的进步意义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它越过宋元人的经注、语录去探求早期儒学和儒家经典的本来面貌。由于尚不可能有历史社会学方面的新知识和科学的历史观，考据家们并未能担负起这个使命。但他们是作了非常有益的工作的。二是它纠正了理学家空谈性理的缺失，提倡实事求是的研究方法。三是拓宽了我国古代文化遗产研究的渠道，由经学而小学（文字语言学），而史学、地理学、诸子学，乃至天文历算等自然科学，其规模较宋、元、明三代

的学术都要广阔，为后人全面研究文化遗产提供了一批经过整理的资料和一批可供参考的优秀成果。但是，这一学术思潮也有其严重的缺陷：这就是厚古薄今和重书本轻实际。对于这个缺陷，我们是不能责备那些考据学大师的。它是历史的产物。在清前期那种思想统制极为严酷的情况下，我们怎能要求学者们面向现实提出自己的看法呢？因此，我们也就不能期望它对文学有很多积极的影响。文学创作同学术研究有所不同。学术研究也需要有新的时代眼光，但学者还可以忽视现实而在某一个古文化的研究领域中取得某种新的成果；文学作家一旦脱离现实，他的书尽管读得多、写作技巧尽管高明，也是难以写出伟大的作品来的，甚至可能带来情思枯涩、堆垛故实等缺点。清代的文学作品，除小说外，杰出的作品多在两头，而在考据学最盛的乾嘉时期则较逊色，即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当然，这一时期也有较好的诗文创作，但那是作家们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考据学影响的结果。考据学本身除了在促进作家提高文化修养和摆脱僵化的理学教条束缚外，似乎很难找出更多的积极作用。

（三）对清代理学及其与文学的关系的认识

讲理学史的学者大都不注意清代，从理学理论的发展来说，我们确实无必要去多注意它。但理学作为清朝的官方哲学，其影响是不能低估的。本书已在有关章节论证：就是在考据学最盛行的乾嘉时期，理学在全国范围内也仍有其广泛的影响，内地许多省份固然仍处在理学的笼罩之下，就是在考据学中心江、浙等省，不尊理学的也不多。许多考据学家虽治经尊汉儒，谈立身处世，却仍奉理学为主臬。又，理学理论在清朝虽无多少发展，但不能说清朝的理学没有特色。如果要作概括性的论述，

似可分为三个阶段：

清初前三十年（约数）为一阶段。这时理学与经世致用之学相结合，产生了黄宗羲、王夫之等大师。他们或者对王学作了批判性的总结，或者对张、朱学作了批判性的发展，在理学史上都有光辉的地位，特别是王夫之，可谓是理学的殿军。只是由于他们的学问规模都很大，又有许多突破理学框架的见解，因而现在有许多人已不把他们当理学家看了。第二阶段约从康熙中期起，至嘉庆时止，我把它称为全面趋向实用化、庸俗化的阶段。理学的庸俗化并不始于清，元明科举考试命题以理学家的经注为准绳，既是理学的普及，也是理学庸俗化的开始。但元的经义文没有程式化，明的八股也还容许考生有发挥，清代的八股文则更趋僵化了。不过，这时并非所有的人都只把理学当作获取科举功名的敲门砖，如汤斌、张伯行、张烈、魏象枢、朱轼、王懋竑、李紱（王学）以及方苞、姚鼐等都是比较认真地信奉理学的；颜元、李塨等有某些反理学的观点，在实践上也与理学家一脉相承。然而他们对宋明理学家的性理哲学都少有发明，甚至没有什么兴趣（如方、姚），他们关注的主要是理学家所强调的封建伦理道德的实践。所以，他们的理学，只能说是实用的理学。此外，当时还有一些所谓义理宗宋儒，经义考据宗汉儒的学者，如江永、朱筠、王昶等等，他们所宗奉的义理，固然包括性理哲学，但于这个哲学更无任何发明，实际上只是拿来作维护伦理道德的依据，即所尊的也是实用的理学。第三阶段是道、咸以后，这时理学再度与经世致用之学结合，而与今文经学派汇合成一股新的经世致用学的潮流。曾国藩是其突出的代表。但这种与经世致用之学相结合的理学，与清初黄、王等人的理学是大不相同的。曾国藩是读过王夫之一些书的，学

问的规模也比较阔大。但他在理学方面实际上承接的是方苞、姚鼐的传统，对性理哲学无所发明，似亦少兴趣；在政治上也未提出像黄宗羲那样的改革主张。其所长在于善用封建伦理关系的精神去治军、治政，并能顺应时代要求办洋务。从理学的发展来看，仍是一种实用的理学，只是在实用性上推广了，扩充了。至于与曾同时或先后提倡理学的人如唐鉴、倭仁之流，则不过是一批腐儒而已。

清代康熙中期以后的理学，既然基本上是一种实用的、庸俗化的理学，所以，它同传统儒学的区别并不大，主要是传统儒学对封建伦理道德的解释较灵活、较近人情，理学家则加上天理的包装，使之神圣化、绝对化了。但这个区别对文学来说却是重要的。文学必须切近人情，不近人情，则文学之花就要萎缩。故一般地说，凡受理学影响深者，其创作必少生气。不过，也不可一概而论。因为文学本身又有自己的规律，也给作家以影响，故工文者往往能在某些方面突破理学的束缚；又，人的感情也颇复杂，有与理学教条相冲突的，也有不冲突的，清初的某些遗民作家也信奉理学，但却能写出充满浩然正气的诗文，就是因为他们所怀抱的民族大义，同理学并不冲突。其他可以类推。故论到一个作家和一篇作品还要具体分析。本书即采取这种态度。

（四）关于清代学术思想、文学发展的分期和本书的章节安排

关于清代学术思想和文学发展的阶段，各家的分法不同。本书考虑到多数学者的意见，把雍正以前作一段，嘉庆以前作一段，光绪初年以前为一段，晚清（大致从维新运动开始）为一段。这样分实际上还存在一些问题，其中最难定的是第一、二

两阶段和二、三两段的划分。因为无论从学术思想和文学思潮来看，明、清之际都应是一个阶段。这是一个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很尖锐、社会大动荡的时期，也是一个学术思想发生重大变化，名家挺出，文学上（以诗文为主）高扬着时代主旋律，百花怒放的时期。大致以康熙平定三藩之乱为界，学术上和文学上的生动局面就渐渐地消沉了。学者们或者忙着将理学实用化，使之适应清朝统治的需要，或者专心研究历史文献以发挥自己的才力；作者们则多用雅正和平之音来表现鲁迅所谓“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这个情况基本上延续到乾隆末。其间当然也有唱别调的，如吴敬梓以其杰出的讽刺小说《儒林外史》揭露了当代士人精神的空虚和理想的破灭；曹雪芹以其杰出的小说《红楼梦》揭露了上层社会的堕落和封建伦常的危机；戴震以其《原善》、《孟子字义疏证》抨击了理学家“以理杀人”；袁枚、赵翼则力图给诗歌注入一点生气。此外唐孙华、查慎行、戴名世、黄景仁等也时有一点不平的声音。但这些别调都是比较低沉的。吴、曹的小说都笼罩着浓厚的悲观气氛，戴震的学说裹着厚厚的复古的外壳，其余就更为微弱了。从乾隆末年起，情况有了变化。学术上，重视理学思潮的复兴和今文经学的兴起以及阮元等对自然科学的重视都预示着人们对现实问题的关切，为道光间经世致用之学的再兴开启了先路。文学上，洪亮吉、张问陶、舒位、王曇等人也开始较多地创作关切时事之作，成为龚自珍、魏源等人的前导。不过，从学术思想的变迁来说，乾、嘉的关系更密切。因此，本书仍以雍正以前为一段，道光以后为一段，在具体论述中则注意这两个阶段中前后的变化，以弥补这种分段的缺陷。

清代学术思想和文学思潮虽大体上可分为四个阶段，但有

些文学现象常有一贯性,还有些文学现象游离于主导倾向之外,如完全按阶段论述,反而会显得支离或牵强。如散文中的桐城派,从康熙时开始,经乾、嘉而流行及晚清,虽因时期不同而有变化,一贯性却是主要的。骈文和戏曲也有较明显的自身发展规律。因此,本书都另辟专章加以叙述。小说稍异,前两个阶段内部联系较紧密,而与时代思想主潮不甚相应;后两阶段则同时代思潮呼应较密切。因此,本书也分别作了不同的处理。按理本书还应论及词、散曲和赋,但清代词、曲基本上已经雅化、诗化,发展的阶段性与诗亦略相当,且已有人写了词的断代史和散曲的专史,我没有多少意见可说,故从略。赋则同骈文的发展轨迹相近,且本人在《赋史》中作了较详的论述,可补充的地方不多,故亦省去。这也是我写本书的一个原则:凡别种著述已详论而与本书的观点相近或相同者,只作概略的论述,如无伤大体或可推知,则干脆省去。别种著述论略而不详或与本书的观点相左者,则加以补充或论辩。因此本书的详略是不完全按照一般文学史、思想史的常规的。

首先是各个阶段的详略不同。清朝从顺治元年算起到宣统三年被推翻止,共二百六十七年。按照本书的分段,前两段共一百七十六年,后两段共九十一年,但前后两段的篇幅大致相等,后两段中的前段计有六十余年,最后晚清一段仅二十余年,晚清一段又详得多。这是考虑到愈到后来愈与我们相近,特别是自道光间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开始由封建社会转变成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学术思想和文学也逐渐在变,由于近代资产阶级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输入,形成了所谓中、西两种文化思想互相碰撞和融合的新局面。中国向何处去?中国的文化向何处去?成了当时中国人所面临的严

重问题。而答案却是各种各样的，本书不可能对前者详作剖析，对后者则不能过于简略；而对此，近人的看法又不一样，认真研究的人也较少，我就不能不多说几句，以逞其臆见了。其次，对各部分的论述我也未守常规，如清初两大诗人钱谦益、吴伟业，我就没有多论及他们的作品，而花较多的篇幅来论述钱在开拓明清之际经世致用的学风与转变明末文风上的作用。乾隆时的学者戴震，我对他本人的思想介绍得很略，而对其影响反而说得多一点。推而至于他事他人亦然。

这样写，也许会招来非议。但现在大家都很忙，出书又很不容易，还是节省一些相同的话，多说一点自己的一孔之见好。一孔之见未必对，当然也不免浪费纸墨，浪费自己及别人的精力，但从主观上说，毕竟是尽了一点心意。不过，这只是我写本书时的一种意愿。实际上，本书引用常见的材料和吸取别人研究的成果是很多的。又因精力不济，时作时辍，思虑不周或掺杂水份的情况也是有的。曾欲痛加删削，又怕本书的大旨不能表达，踌躇不能下手。然学术本公器，即使有大才，离开常见的基本事实和已有的研究成果也不能前进一步，何况我呢？只好任之了。

马积高

1994年除夕于岳麓山下风雨庐

目 录

前 言	(1)
一、清初学术思想的变迁与诗文	(1)
(一)经世致用之学的兴盛及其蜕变	(1)
(二)经世致用之学对散文的影响	(19)
(三)诗风的演变与清诗特点的初步形成	(34)
二、清代理学与桐城派	(76)
(一)清代理学的流变	(76)
(二)桐城派主要作家对理学的态度	(83)
(三)理学与桐城派的古文理论及实践	(89)
三、清代考据学与骈文的复兴	(98)
(一)清代骈文复兴的两个基本原因	(99)
(二)考据学对骈文的影响	(105)
(三)对清代骈文的评价	(110)
四、乾嘉的汉、宋学术之争与诗风的嬗变	(113)
(一)崇雅诸派的发展	(119)
(二)袁枚及其性灵派	(148)
(三)后起的诗人群	(175)